

目 录

我的家庭——我的根	(1)
我对故乡风土人情留下的一些印象	(15)
上中学了	(20)
东北旅平妇女救国会	(25)
旅平东北各界救国联合会	(37)
对东北大学进步同学的大逮捕和张学良 老校长的营救	(41)
狱 中	(43)
北平东北大学	(48)
南下请愿	(53)
“双十二”事变	(58)
奔往延安	(60)
西北工业合作协会宝鸡分会	(67)
第二次去延安	(73)
延安中央党校	(78)
延安整风运动	(81)

2 我 的 人 生

中共第七次党代表大会	(88)
延安整风时 ,我的一些遭遇	(89)
张家口平绥铁路局工作	(94)
东北行政委员会	(98)
东北工学院	(106)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	(111)
回到沈阳	(127)

我的家庭——我的根

名字：柳文，原名叫刘士范。这个名字是我1940年第二次回延安，决定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，请王鹤寿同志帮我改的。当时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陈云，组织部副部长是李富春，干部科科长是王鹤寿。当时许多同学到延安都想改个名字，三个字的改成两个字，而且字的笔画比较简单。比如“丁一”就是×××到延安改的。

我一到组织部去王鹤寿同志那报到，就提出这个要求。我说：“我的名字笔画太多了，不好写。”鹤寿同志说：“怎么改呢？”我说：“用我的俄文名字柳霞改吧！”鹤寿同志说：“你就叫柳霞吧！”我说：“这也笔画太多。”他说：“那就把雨字头下边加个文吧！”我说：“雨字头也不要，就叫柳文吧！”这就定下来了，一直叫到现在。中间还有个故事。1992年，我收到北京大学一位研究生的请柬，说 she 想在北大组织一次柳氏侨民宗族的研讨会，请我去参加。我说，我的名字是后来到了延安改的，她说那也没关系。我不想冒名去参加，谢

2 我的人生

绝了。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估计是从《华夏妇女名人词典》或《满族大辞典》上发现的。

我的民族是满族，老人说过是镶黄旗，指的是后入旗的，远祖还是汉人。

家乡原籍：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十里河旁边有一个小村庄叫“新庄”，我知道我的曾祖父、祖父母都在这里生的。传说十里河是一个历史较久、小有名气的火车站。村里传说，清王朝最早曾想在辽阳建都，十里河曾想作为搬运时的驿站，比较繁华，是周围村庄去购物的中心。记得小时候，过年“打年纸”都到十里河去打（“打”就是买）。“年纸”就是过年时，家庭的必需用品（如祀祖的香火），供的佛祖、灶王爷、门神爷、写对子的红纸。挂签，给姑娘、媳妇买副腿带等。那里也是农产品、粮食等的转卖站。

出生地：过去叫“广宁”，在医巫闾山下。当时父亲是广宁县邮政局局长，我出生不到一周岁，父亲又调到另外的地方去了。现在北镇县改作北镇市。几年前出差去那里，还请地方领导帮我找几位年纪在地方上算是最大的，帮我回忆一下当时邮政局的旧址。他们指定了一处是年代最久的老邻街房，他们也是听老人们的传说。我去看了，现在是一处公安派出所，我去摸摸墙

壁，问问左邻右舍，都说这是该城最老的一栋邻街的房子了。也等于我拜访了我自己的出生地。

我的曾祖父、曾祖母

曾祖父：是小地主，清朝的小官，说是给清朝收集贡品的。当时的“嘎拉哈”也是贡品，是供宫里的宫女们玩的。一次我在家的时候，春节前要收拾卫生，我也跟着忙活，在我家的箱子上发现有些旧书，其中竟有《红楼梦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金瓶梅》等，心想曾祖父还挺喜欢读书。

曾祖父做过的第一件善事，就是为了住在后村的小学生们上学方便，把前场院（秋天脱谷，冬天堆柴火）靠学校的地方捐出一米来宽的通道。这样后村的学生上学就方便了，不必在村子里绕大圈子，浪费时间。被人传为佳话。

再有他四十多了还没有儿子，用几亩地讨了同族的一个男孩，过继给自己作儿子。已经办完过继的手续和仪式，可是过了一年曾祖母怀孕了，生下来的竟是一个男孩。那天，曾祖父从十里河购物回来，全家都到大门口去迎接祝贺。曾祖父特别高兴，回到家里立即决定，过继的儿子不悔约了，地不要了，两家今

4 我的人生

后可以当亲属走动。也是过继儿子，给自己带来了亲生儿子的喜事。

曾祖母：她嫁到刘家来的时候，带过来好几亩地作为陪嫁，所以在家里很有地位，为人也很善良。当时农村里打发乞丐都有一个小木斗，但大小都不一样，有的只能装一碗多米，有的竟可以装两碗米。据说，我家的小木斗就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有的乞丐，不知从哪里抓到一只鸡或一只鸭，想送给曾祖母，曾祖母坚决不要。

再有就是夏忙秋收割地时，要请临时工，院里摆上长条桌子，菜总是比较丰富，黄瓜、大葱、曲麻菜、大酱，一定要倒上一些豆油，还要设法做道熟菜，如烹点茄子、土豆等，尤其高粱米饭，不能做得十分熟。做得过熟了可以节省点米，但不经饿，农民希望吃九成熟的，才经饿，但要费一些粮食。这也是慈善人家的一种表现。

祖父、祖母继承祖辈的遗产过着安定的生活。祖父活73岁，祖母活84岁。农村传说73、84是老年人故去的吉祥日子。外祖母家在灯塔公社（原名古树子）祖辈都是农民。

我的父亲

父亲：1819年生，名刘振生，字化风。年轻时一直在家乡或外祖父家读私塾。18岁了，祖父给买了一双新“乌拉”、一把新镰刀，要正式下地干活了，这是农村的规矩，实际上也就是农村人的成年节。正巧这时，沈阳城里传来消息，说城里邮政局要招考邮务员，年满18岁、有相当于中学文化程度的男青年就可以报考。父亲去报了名，并准时参加了考试。考试结果公布后，父亲被录取了，全家都很高兴。任期40年，不犯错误，可以干到58岁时退休。我听说，家乡附近这一片就父亲一个人考进了邮政局。那时邮政的规章、邮政的工作，还是比较稳定的，住公房，用公家的家具，一年发13个月工资，但在一个地方工作不能超过三年，到三年末，你就收拾行李，到时调令一定下来，不能讲价钱，接任的人一到，把行李装上邮车就走，当时邮车是马车就上马车、邮车是汽车就上汽车，下一任的地方通火车，就上火车的邮车，非常方便。这时邮政总局还有规定，在辽宁考上的得到外省去工作。同时不能用自己的子女亲属到邮局工作。省局设有巡员，差不多每年都来检查一两次。父亲是奉公守法的，四十年中没听说受过什么处罚

和批评。

我的父亲在沈阳考入邮局不久，即去吉黑邮区工作。父亲主要是在黑龙江省，如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双城堡、三义河、黑河等地方都待过。有的邮局很小，编制又很严，加上邮差只有十多名员工，但也要有一人是局长。“九一八”以后，日本人想把父亲留在东北哈尔滨工作，派日本浪人到家里去说服父亲。那时我已是哈尔滨女一中高中学生，已受到一些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。我坚定地告诉父亲，无论如何不要留在东北工作，赶快和同事们进关。不久，邮局的职工组织起一批同事，决定进关去工作。他们决定从营口乘船先到天津报到。一天，大家正在搭着跳板走进船舱时，父亲被日本宪兵拉了下来。父亲这时害怕了，一定是那个日本浪人留下话，不让他走，要把他扣下。这时领队的安二叔（我只记得姓安，是父亲的好朋友，也是这批撤退人员的带头人）马上从跳板上跳下来，大声呼叫着告诉爸爸不要害怕，他们要不许你走，我们都不走，我们是办了撤退手续的。日本宪兵看着这个架式，又把爸爸放回到撤退人员的队伍中，上船了。父亲后来讲，等汽笛拉响了，轮船离开口岸，在大海上时，说不出那种高兴劲儿，可算逃脱了虎口。他们先在天津工作一段时间，后

来这批干部都调到陕西邮区，父亲又在陕西的天水、汉中、宝鸡做了几任邮政局长，并在汉中退休。

父亲的为人和作风，使我不能忘怀的，有以下一些小事，是值得我永远怀念的。

父亲在邮局工作，他有方便的条件，他自己不必订报纸，凡是从邮局邮寄的报纸，送的前一天，他们都有机会看，即使外边有纸包裹着的，他们也有绝招把它用手指抽出来看，第二天发送前再插进去，不影响订户。那时候就有比较进步报刊，他们还是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。

父亲对在职员工，要求从严，处理从宽，职工犯错误，他敢于批评，不轻易开除。大家都很感谢他。在工作高峰期，职工需昼夜加班加点，照明不够时，他都在工作现场挂满了吊灯，给工作创造良好条件。

他对子女不分男女一视同仁。他说，不想给孩子们留更多横产，主要供大家读书，男女都一样，能上大学的他都支持。

他对儿女也特别爱护。我记得5岁时得过一次腋下炎，发高烧。那时，我已经记事，父亲下班后总是帮着母亲，抱着我在室内走来走去，还请教会的医生帮我看病。

他特注意卫生。每天睡觉以前，让孩子们一定洗脸

洗脚以后，才能上床。他调动工作时，距离稍远些，中间要住旅店，一住下来，就在屋内屋外先打扫卫生，不管住几天，室内室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我也学习了父亲的这些习惯。一次到厦门出差，住在辽宁驻厦门办事处的宾馆。我住房的过道外边比我住的低一层的楼顶上全是垃圾，破鞋、臭袜子、空瓶、破纸盒子、果皮……我待不住了，从卫生间拿出扫帚、耙子，从过道窗台跳下去开始清扫，都集中起来有五六堆，每堆都可以装一大塑料桶。我正要到各公厕的卫生间去找桶，被他们的经理发现了，他马上带几个服务员上来把垃圾装好，提下去了。我未说什么，他们也未说什么，不知以后他们是否会定期打扫。那时候这不是个别现象。是凡我住过的各地宾馆、招待所或医院，只要是楼层不一样，比你住的低一层的楼顶都有这一现象，甚至一些宾馆前门的顶上平台部分都是这样。这真是服务员和住客的“德”的问题，有的是顾客直接丢的，有的就是服务员丢的，领导不关心监督，服务员也不把打扫这些垃圾当作是他们工作份内的事。现在可能都改善了，这是过去的事。

我是满族，是不缠小脚的，但女孩子总要用布缠缠脚的前半截，不要长得太宽，否则穿鞋也不好看。小时

候，母亲总用布条给我缠缠，但每天晚上父亲就全部给我解下来，并劝妈妈不要让孩子受这个罪了。

“九一八”以后，父亲调到西北去以后，国民党也多次找他谈话，要他参加国民党，父亲都婉言“谢绝”了。父亲说，干我们这一行，有敬业精神就行。后来也没有人勉强他。他只靠自己的熟练的业务，到哪里去干都可以，不靠什么党派得到什么升迁和重用。

父亲也因为我的工作，受到过特务的威胁。我在宝鸡西北工业合作协会工作时（这是新西兰的国际主义战士路易·艾黎和宋庆龄主办的），我在那里作党委书记。1940年反共高潮时，得到情报，敌人要对我下手，组织上很快派人把我护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掩护起来。但特务派人多次到邮局去踢开父亲的门，向父亲说，你叫你女儿留下来吧，给共产党干和给国民党干不是一样吗！父亲就说，我只是攻她读书，她给谁干，我根本就管不了她，你们威胁我没用，父亲都很冷静地回答了他们。他们也未敢对父亲下手。据说，那时宝鸡县的县长（姓王）还是比较有些进步思想的，和父亲关系较好。那时有些进步青年想到延安去，想坐父亲的邮车走一段，到靠近延安附近的县去，然后步行去延安。记得过去一位很有名的记者，就是坐邮车顺路去延安的。这些

去延安的青年走时，把多余的不便携带的衣物，都丢在邮局了，父亲都分批打包送给竞存中学的校长车向忱了。由他分配给学生们用。

父亲年轻时，正赶上日俄战争。日本鬼子进驻新庄，就曾驻扎在我家大门口。他们在门外做饭时，就到我家后院去抱柴火烧（就是高粱秆），父亲和他们争吵，说这是我们做饭需要的，你们为什么随便拿去烧呢？日本鬼子气愤地说，我们走到哪烧到哪里，你敢管吗？你再管就把你撕了（意思就是杀了你）！爷爷、奶奶很着急，正赶上家里在做豆腐，就赶快给日本鬼子送出去一些，说他是孩子你们不要在意。日本鬼子消了气说，我们是吓唬他的，不会杀死他的。这对父亲的童年，也是一次爱国主义教育。

我的母亲

母亲是辽阳市古树子人（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后改叫灯塔公社）。五六岁时跟母亲去过一次，是老舅结婚以后，去看新娘。坐大车也要走三四个小时。那是一个比较僻静的山村，有山有水，沿途渴了就下车摘点酸姜野菜，用水洗洗吃了就不渴了。外祖父已不在，外祖母给杀了一只鸡炖蘑菇，不要说那个香劲儿了。以

后未再去过。

母亲名字叫马秀岩，汉族。母亲和父亲结婚时17岁，父亲15岁，那时认为女的比男的大两岁是最吉祥的婚姻。清朝末年还流传满汉不通婚，满汉不过产（即满族土地不能卖给汉族），但不知他们是谁介绍的，突破了这个陋习。所以母亲出嫁时，都是满族打扮，梳大京头，穿旗袍、花盆底鞋，招待客人是，装烟请安，不叩头（右手压着左手扶着左膝盖下蹲）。现在想起，那时的大头发翘上面插满金钗银钗和大花，要磕头真是不可想象的了。那时相姑娘，首先要看看“后沿乙”，因为梳大京头要扎“后沿乙”的（就是看你后面的头发是不是很长），越长越好，梳大京头时，后边不必续假了。

以后，母亲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是男孩，阖家欢乐，因为曾祖母四十多岁，已经讨了儿子，又才生下祖父，母亲的第一胎，就是男孩，当然大家都特别高兴。当这个孩子一周岁将过不久，因姑姑结婚，母亲带着孩子，以嫂子的身份送小姑子去婆家，这也是旧社会规矩。但不幸的是，孩子在外边得了传染病，回新庄不久便故去了，举家都很伤心，尤其是母亲。父亲给母亲多次写信，劝她不要过分伤心，要妈妈到一个满族

女子职业学校去学习，学文化、学缝纫、学纺织。所以，父亲写给她的信，她大致能看懂基本内容，因她在职业学校学习时，也学了点中国文字。我还记得我看过父亲的信，对妈妈都称呼“爱妻马秀岩”。母亲在学校学会了使用缝纫机，我们小时候的衣服，都是妈妈自己做的。当时买的是德国的缝纫机。中国产的由右边纫线，德国产的是从左边纫线。我也跟妈妈学缝纫。两种缝纫机家里都买过。

父亲到哪里工作，母亲都陪着。母亲性格很开朗，也很刚强，不管家里遇到什么困难，或爸爸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，她都能帮助父亲顶着。如在邮局汇兑处，由于失误，给一个汇钱的人多付了款，追不回来了，要用自己的工资给补足，母亲就劝父亲不要上火着急，这些小的失误在几十年中是免不了的。

母亲也不小气。解放回到沈阳以后，孩子们和亲戚朋友来看望他们的时候，总会带一些穿的用的布料之类，但她转手就送人，什么都放不住。

父亲是在陕西汉中退休的。当时又不知道我的下落，还能不能回到东北来，心里没数，就想在西安安家落户了。父亲在西安的南郊买了三亩多地，准备用退休金在那盖套房子，颐养天年了。后来东北解放了，沈阳

解放了，我在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人事处任干部科科长，也分到了一套房子（北陵大院南新村，那时都是住公房）。当时车向忱任东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主任。父亲在西安报纸上看到车向忱的任职情况，很快就给车向忱写了信来，问我是否还活着，如还活着现在在哪里，请车老能给他一个回信。我从车老那里得到了他们的信息，很快给父亲回了信，并寄去一张照片，我也问了母亲是否还健在。很快就和他们取得了联系。不久，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和马明芳到沈阳来参观。杨拯民是我在西安东北救亡总会工作时，介绍他到延安去学习过，很熟悉。我请他回西安以后能给我父亲捎个信儿去，请他转告父亲，准备把他们接到东北来。他们回去不久，便向陕西省委作了汇报，陕西省委很快决定由省委出路费把他们送回来，走前还请他们吃了饭，父亲还送习仲勋的孩子一枚金戒子作为纪念。回到沈阳，他们还未直接找我，先住在一个饭店里了，和我联系上了以后，第二天我才把他们接到北陵大院的南新村——我的家里，因为他们对我的工作和居住条件一点也不摸底。一家人总算又团聚了，这是1950年，分别整10年了。高崇民、车向忱、林枫分别请父亲、母亲吃了饭，一是祝贺我们相别十年后团聚，也感谢父亲在他们做地下党工

作时给过他们的一些帮助。

记得章岩同志还向我提过，是不是吸收父亲作政协委员。我考虑父亲在邮局一直工作了四十年，调动频繁，每地都只停留三年，业务单纯，和各地的地方上层人士没有什么长时间的接触，参加政协，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，就这样谢绝了政协的想法。

我对故乡风土人情 留下的一些印象

我在小时候曾随母亲回过两次故乡——新庄。母亲回到父亲工作地点后，我曾留在乡下两次，一次是冬天，赶上过年；一次是夏天，正是农忙收割季节。一次还考上村里的小学，在农村小学里读了两个月书。时间加在一起，不到一年。因父亲母亲想我，又把我接回到他们工作的地方了。

一直到1997年，我才又回去一趟，这已是80年以后的事了。没有一个人还认识我，那里已没有一个亲属，我未去看旧宅，未去看祖坟，只给乡村小学捐赠了一套图书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，给乡里的老人送了一些烟酒。去前，未通知地方领导，乡镇的领导干部都不知道。我知道午间不一定赶得回来，所以，午间的饮食也是自己带去的。后来，不知道怎么传到镇上去了，镇里的干部都来了，倒打乱了我想细细看看我故乡原来痕迹的计